

孫吳「彈性外交」述論

謝 偉 傑*

摘 要

歷來討論魏、蜀、吳三國關係的論著多著眼於蜀、吳聯合抗魏。本文嘗試以吳國為本位，分析孫吳政權（西元200-280年）如何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透過推行「彈性外交」以求取生存空間。所謂「彈性外交」是指孫吳並不囿於固定路線，伺機而動的一種外交策略。孫吳得以施行「彈性外交」的原因可以從兩方面分析。一、「國際秩序」的結構性因素：即1.魏國一時不能滅吳，對吳國的反覆無可如何；2.蜀漢既無力滅魏，又需要吳國作為盟友，只好作出容讓；3.吳國缺乏進行統一的正統論基礎，弊處在於與魏、蜀相比時不能提出鮮明的正統理論，需要依違其間，好處卻在於吳國因而缺少了正統論的包袱，可以隨利益而改變立場。二、國內政治因素，即1.吳國長期受山越困擾，需要安定內部；2.吳國發展出「保江東、觀成敗」的立國觀念，在保守江東的基礎上，為生存、發展可因應時勢而改變外交立場。

關鍵詞：三國、孫吳、孫權、正統、彈性外交

一、前 言

揆諸中國歷史，自漢朝開始，舉凡天朝大國與周邊民族、國家的交往，都包括了使節往還、冊封、賞賜、進貢、互市、戰爭和盟約等活動。¹每當中國處於分裂時期，政治局面由大一統的一元格局轉變為列國分立的多元格

*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現為泛太平洋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編輯。

1 對中國古代外交的概述，可參Jing-shen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pp. 1-9.

局，各個割據政權之間，既有相互的和戰關係，又各自與中國以外的民族、國家進行交往，形成千絲萬縷，令人眼花撩亂的外交關係，情況便複雜多了。這時的中國內部，實存在一個「國際性」的體系。

由於經濟、軍事等力量的差異，國際體系之中必然出現強國與弱國分立的局面。強國擁有的優勢，往往代表一種霸權秩序，主導國家之間關係的發展，並對較弱小的國家產生等級關係。² 強國如何建立、維持，以及有效行使霸權固然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重要項目；但弱國如何在強國之間或霸權秩序之下謀求生存，也是不可忽略的課題。學者在研究五代十國時期吳越的外交關係時指出，吳越國巧妙地利用了「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的原則以平衡各方勢力，而得享七十年的國祚。³ 因此，「弱國無外交」是不能一概而論的，關鍵在於弱國如何利用當時的環境以拓展生存空間。針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本文嘗試以三國時期分裂局面中較弱小的吳國的外交關係作一個案研究。⁴

選擇三國時期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三國的分立，是秦漢大一統帝國建立後，第一次出現較長時期的列國相爭局面。⁵ 探討當時三國的相互關係、各國的外交手腕，可以提供一個角度了解三國的盛衰。

魏國曹氏位居中原，由漢獻帝禪讓而得國，極為強調自身的正統地位，並要重建大一統帝國。魏國對於這個原則絕不妥協，不會接受分裂的局面，尤其與自稱紹承漢室的蜀漢不能並存；對於吳國，魏亦只能接受對方稱臣納

2 Joseph A. Camilleri and Jim Falk,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2), p. 33. 中譯本見約瑟夫·A·凱米萊爾、吉米·福克爾著，李東燕譯，《主權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 39。

3 Edmund H. Worthy, Jr., "Diplomacy for Survival: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Wu Yüeh, 907-978," in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7-44.

4 本文以吳國為「較弱小的國家」，是相對曹魏而言的。

5 春秋戰國列國並立的局面是處於封建狀態之下，與秦漢大一統帝國以後的分裂局面不同。關於先秦時代的國際關係，可參看劉伯驥，《春秋會盟政治》(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2)，又見 Richard L. Walker, *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Hamden, Conn.: Shoe String Press, 1953).

貢，而不承認對等的關係。魏國在當時的國際體系中，處於強國的位置，作爲一個霸權而存在。蜀漢本著漢賊不兩立的原則，亦不能與魏並存；對吳國雖有聯盟之名，卻因彼此皆有一統天下之意而存在不穩定的因素。對於以復興漢室爲號召的蜀漢，與孫吳維持對等關係的聯盟，實在不過是應急之計而已。相對而言，吳國在三國之中，卻採取了一種頗富彈性的外交策略：既與蜀聯盟抗魏，卻又隨時準備在蜀漢身上攫取利益；既可向魏稱臣，卻又與蜀聯盟抗魏，甚至拉攏遼東公孫氏以牽制曹魏。比較之下，吳國的外交政策伸縮性較強、較爲靈活，本文稱之爲「彈性外交」。所謂「彈性外交」，是指國家爲了追求自身生存、發展，可以因應現實環境、國際關係而作出改變的外交態度，是一種不囿於固定的外交路線，講求彈性與伸縮性技巧的外交策略。⁶

當然，從三國的歷史中，可見孫吳與蜀漢的結盟是佔較長時間的，因爲雙方深明單憑一己之力，不能抵抗曹魏，遑論北定中原，統一天下。南方二國結盟才是抗衡曹魏的最佳選擇。不過，在吳、蜀聯盟的背景下，孫吳並非一直扮演著忠實盟友的角色而別無他圖。實際上，吳國利用當時環境所提供的機會，施行「彈性外交」，向著目標步步前進。孫吳獨特的外交策略，便是本文嘗試探討的問題。

茲先敘述孫權於西元200年統領江東，以至280年晉朝完成統一的八十年間，吳國的外交策略。今以200年開始，是因爲此前孫堅、孫策並未建立穩定的政權，直至這一年，孫策臨終，明確制訂了江東的發展方向，而孫權繼任統領，才得以貫徹施行。同年，曹操勝於官渡，鞏固了在北方的地位，孫吳主要外交對手之一的曹魏從而確立；208年，赤壁戰後，劉備的勢力逐步形成，演進成孫吳的另一外交對手——蜀漢，三國鼎立之局由是開始。⁷我們著意觀察吳國外交策略的地區特性和時間因素，前者是指吳國對魏、蜀

6 有些學者對於拜占庭的外交會運用「彈性」的概念進行討論，可參考 Alexander Kazhdan, "The Notion of Byzantine Diplomacy," in Jonathan Shepard and Simon Franklin (ed.), *Byzantine Diplomacy AD 800-1204* (Hampshire: Variorum, 1992), p. 5.

7 對於三國鼎立的局面形成於何時，學界存有爭議，可參景有泉，〈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問題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5: 8-11。一般的看法認爲始於赤壁之戰後，本文亦偏向這一看法，因爲自赤壁戰後，孫吳的主要外交對手就已固定爲曹氏與劉氏，與此後三國稱帝的時代並無大異。

的不同態度，是橫向的觀察；後者是指吳國外交策略的變化過程，是縱向的觀察。透過兩者相互推進，不但可顯示孫吳「彈性外交」的內容，而且能夠進一步從國際秩序的結構性因素，和國內政治因素兩方面去探討孫吳施行「彈性外交」的條件和原因。

二、西元200-280年孫吳的外交策略

200年，孫策逝世，孫權繼承兄長，統領江東。孫策臨終之時，囑託張昭等輔助孫權云：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⁸

又對孫權說：

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⁹

孫策雖然早逝，但在他短短的一生，率領不滿三千人的兵力「渡江轉鬥，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¹⁰乘北方擾攘之際，得以在江東立足。爲了站穩腳跟，孫策不得不把所有力量集中在消滅江東的反對力量之上。¹¹適值此時，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爲了專心經營北方，亦有拉攏孫策之意，向孫氏採取了友好的舉動。¹²對孫策而言，與曹操交好是必要的。他雖然取得江東之地，但仍然需要漢政府的承認，以使名實相符，這對他擺脫袁術的控制也是甚有幫助的。¹³在北方無憂的情況下，孫策就可以專注底定江東，蓄積力量，待機而動。當袁、曹相持於官渡，孫策認爲爭霸天下的機會來了，便計劃偷襲許都，將漢獻帝掌握在手中，代替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然而，計

8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6〈孫破虜討逆傳〉，頁1109。

9 同上註。

10 同上註，頁1102。

11 可參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載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44-275。

12 史載曹操「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孫策從父）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見《三國志》，卷46〈孫破虜討逆傳〉，頁1104。

13 方詩銘，《三國人物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84。

畫未遂，孫策的遺言，就為孫氏江東政權定下了「保江東、觀成敗」的基調。所謂「保江東」，當然就是確保他在江東打下的基業；而「觀成敗」，意謂立足江東，觀望天下大勢，伺機而爭天下。揆諸當時環境，「觀成敗」是指觀袁、曹之間的成敗。雖然在孫策的西面有「擁十萬之眾」的劉表，但他「安坐而觀望」，¹⁴難成大事，孫策所注意的是北方兩大勢力。孫策本有以江東之眾北向爭衡之意，卻未能如願，垂死之際，恐怕其弟孫權未有北爭之力，遂勸眾人「保江東、觀成敗」，用意就是要伺機而動，找尋適當的發展機會。孫策既與曹操通好，又計劃突襲許都，這樣的外交態度，就已為孫權施行「彈性外交」定下一個模式。所以，「保江東、觀成敗」是一項既有防禦性，又有伸縮性的策略。

孫權繼任之後，立即面對著孫策死後的嚴峻局勢，史稱「是時惟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¹⁵孫權的首要之務就在「保江東」，此時，曹操表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他當然樂於接受，因為他需要漢朝所給予的名號，以便出師有名；與曹操保持友善關係，也可避免在江北受敵，得以專心於經營大江以南。¹⁶

在鞏固江東統治的過程中，孫權開始對「保江東、觀成敗」的方針作出修改，當時，魯肅為東吳規劃了發展的策略：

……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無自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¹⁷

14 《三國志》，卷6〈劉表傳〉，頁212。

15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15-1116。

16 孫策死後，他所任用的廬江太守李術不肯服從孫權。孫權發兵攻之，李術向曹操求援，曹操並未施以援手，避免與孫權衝突。又202年，曹操要求孫權送兒子到許作人質，孫權聽從周瑜勸告而作出拒絕，曹操亦無可如何。這兩次事件中，雙方避免了衝突，當是因為曹操正忙於剷除袁氏的殘餘勢力。因此，雙方的表面友好關係仍得維持。見《三國志》，卷47〈吳主傳〉裴注引《江表傳》，頁1116及卷54〈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頁1260-1261。

17 《三國志》，卷54〈魯肅傳〉，頁1268。

魯肅所言，首要在繼承孫策「保江東、觀成敗」之意。在此基礎上，乘北方的曹操無暇南顧之際，溯江而上，掃除黃祖、劉表，奪取荊州，進一步盡據長江，然後向北方爭天下。有論者認為孫吳意在獨立於江東，不求取得天下。¹⁸筆者並不同意，觀乎魯肅以漢高帝為例，可知他的意思是要孫權為天下主，要以江南為基礎，統一天下。此一計畫得到孫權的接納，所以後來孫權對陸遜憶述魯肅時，便說魯肅為他規劃帝王之業。¹⁹孫權一直在執行這一計畫，三攻黃祖（203、207、208年），雖云為報父仇，實亦是東吳發展的必然走向。²⁰

當劉表逝世的消息傳至江東，魯肅進一步向孫權闡明所宜採取的策略：

夫荆楚與國相鄰接，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²¹

魯肅說明荊州的形勝之處，建議乘機併吞。不過，這一計畫亦顯示了其彈性的一面。若劉備能在荊州站穩陣腳，安定荊州，則孫權宜與之通好；若劉備與劉表的兒子不協，荊州不穩，則孫氏應把握機會，奪取荊州。

適值此時，曹操大軍南下，阻斷了孫權西向發展的計畫。面對曹操的強大軍事壓力，孫吳集團內部發生了和戰的爭議。此時，魯肅提出「將軍迎操，欲安所歸？」²²正回應了「保江東」的底線，直指孫權心窩，因而堅定了聯合劉備共抗曹操之策。

18 李培棟，〈六朝國策異同論〉，載氏著，《魏晉南北朝史緣》（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頁96-97。

19 《三國志》，卷54〈呂蒙傳〉，頁1280。

20 從荊州投奔而來的甘寧便已經向孫權建言：「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見《三國志》，卷55〈甘寧傳〉，頁1292-1293。

21 《三國志》，卷54〈魯肅傳〉，頁1269。

22 同上註，頁1270。早在202年，周瑜就已提出孫權歸降曹操，「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與魯肅所言的意思相同。見《三國志》，卷54〈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頁1261。

挾著赤壁戰勝的餘威，孫權欲繼續其經略長江上游的策略，周瑜就建言：

今曹操新折刃，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孫瑜）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²³

周瑜的意思是荊州既已在掌握之中，下一步便應進取蜀地、兼併漢中，然後便可北向以爭天下，此仍是魯肅、甘寧等人立計之意。而且，荊州對江東有上游形勝之利，若孫吳要保江東，不能不控制荊州，以扼守上流；若要進而圖巴蜀，更加非擁有荊州不可。²⁴因此，孫權對於進取荊州的計畫表示十分贊同。然而，此時劉備領荊州牧，駐屯公安，對蜀地已有覬覦之意，因而對孫權的計畫諸多阻撓。適逢周瑜死去，孫權面對擺出強硬姿態的劉備，爲了維持聯劉抗曹的政策，孫權不得不暫時擱置取蜀的行動。荊州問題卻成爲了孫、劉兩家衝突的導火線。²⁵

214年，劉備取得蜀地，令孫權大爲不滿，立刻要求劉備交割荊州，但劉備刻意拖延，而東吳進駐荊州的官員，又被關羽驅逐，孫權盛怒之下，惟有訴諸武力奪取荊州。雙方之間的戰爭正要爆發之際，曹操趁機進入漢中。劉備急於回益州，只好與孫權和解，達成平分荊州的協定。孫權願意接受這個協定，原因是曹操的大軍既已在漢中，孫、劉兩家與其爆發大規模衝突，讓曹操漁人得利，倒不如順水推舟，讓劉備回蜀對抗曹操，東吳既可坐山觀虎鬥，還得到行動的自由。孫權立刻發動對合肥的進攻，正是爲了利用曹、劉爭持的機會。

進攻合肥受挫，孫權再次把注意力放回荊州。未能全取荊州，實在使孫權寢食難安，而且，劉備盤據蜀地，更阻礙了孫權盡據長江，再北爭天下的

23 《三國志》，卷54〈周瑜傳〉，頁1264。

24 有關荊州的戰略地位，可參考饒勝文，《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頁198-206；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載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93-101。

25 本文經評審人給予意見，提議可比較孫吳得荊州與得淮水流域對其國力增長與國策考慮的影響。筆者翻檢資料，認爲此點可另撰文發揮，故本文暫且從略。在此謹向評審人致謝。

計畫。因此，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這個同盟必不能長久。²⁶ 權衡利害之後，孫權決定在217年與曹操通使，「誓重婚姻」，²⁷ 改變對曹操的敵對態度。

219年，孫權乘關羽圍曹仁於襄陽之際，偷襲荊州，殺死關羽，孫權與劉備正式轉入敵對關係。²⁸ 孫權此舉，是實現盡據長江目標的必然一步。此次行動的統帥呂蒙就一直反對魯肅對關羽的溫和態度，而極力主張透過武力解決荊州歸屬問題，以便孫吳「全據長江，形勢益張。」²⁹ 魯肅死後，呂蒙出鎮陸口，就把收取荊州的計畫付諸實行。

面對與劉備的關係破裂，孫權選擇此時入貢漢室，避免兩面作戰。及至曹丕篡漢，孫權雖沿用建安年號，³⁰ 卻不惜向魏稱藩，受吳王封號，以便專心應付劉備。此時，孫吳的外交政策已由早年的聯劉抗曹轉為親曹抗劉。

孫權的心思顯而易見，魏國因而認為孫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³¹ 要求訂盟，並遣子入侍。孫權推辭的結果，是曹魏大軍南下。孫權面對新破劉備，又有揚、越等地的內亂，再一次對魏卑辭上書，以此拖延魏軍的攻勢。待得自身準備妥當，便臨江拒守。雙方再一次轉回對立關係，軍事衝突因而不斷，如曹丕發動廣陵之役（224年）、³² 孫權乘曹丕之死而出兵江夏（226年）、陸遜與曹休的石亭之戰（228年）等等。另一方面，孫權接受了

26 司馬懿曾評論道：「孫權、劉備，外親內疏」，已可見聯盟脆弱的一面。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1〈宣帝紀〉，頁3。

27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0。

28 孫權襲殺關羽後，想進一步達成奪取益州的計畫，便以劉璋為益州牧，駐於秭歸，伺機入蜀。劉璋死後，孫權又以璋子闓為益州刺史，安置在交州與益州的交界，其意當在借扶立劉璋後人而入蜀。見《三國志》，卷31〈劉二牧傳〉，頁870。

29 《三國志》，卷54〈呂蒙傳〉，頁1278。

30 唐·許嵩，《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上，頁20。長沙走馬樓出土的吳簡亦有建安二十七年的記載，成為江東仍遵用建安年號的實物證據，可參考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5: 26-44。

31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5。

32 田餘慶認為曹丕廣陵之役並非單純的攻吳軍事行動，而是以威懾青徐之地的豪霸為主要目的。見田餘慶，〈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載《秦漢魏晉史探微》，頁89-118。即使攻吳並非廣陵之役的主要目標，這一次軍事行動，仍需要在與吳處於對抗狀態下，才可能發動，亦可見當時魏、吳關係的一斑。

劉備和好的要求，恢復兩國交通。³³劉備死，孫權遣「立信都尉」往弔，就有申明友好之意。此後，蜀、吳經過鄧芝、張溫等使者的往來，重新確立二國的友好關係。³⁴

在魏、蜀相繼稱帝後，孫權忍耐多時，亦終於登上帝位（229年）。稱帝之後，孫權更積極地發動抗魏的外交攻勢。首先派張剛、管篤出使遼東，聯結對魏懷有貳心的公孫淵。³⁵同年，並與蜀漢結盟，相約「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³⁶並且訂約：

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³⁷

吳、蜀二國既約平分天下，又建立一個攻守同盟，協調對魏的軍事行動，不啻是一個滅魏的宣言。

230年，孫權迫不及待地開展對魏的軍事行動，派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凌，事敗未果。明年，孫權派周賀、裴潛出使遼東，雖在成山遭魏軍截擊，但得到公孫淵稱臣的消息，令孫權在心理上得到滿足，以爲公孫淵誠心歸附，而一個對魏國的三面包圍似乎有望實現。爲此，孫權在朝臣的一片反對聲中，於233年派遣張彌、許晏、賀達領兵萬人，帶備大量珍寶，出使遼東。然而，孫吳與遼東的交通，早已引起魏國的注意。公孫淵面對魏的強大壓力，爲了自保，遂不惜殺人掠貨，盡收吳使帶來的珍寶，並斬殺吳使

33 方北辰，〈蜀吳夷陵之戰後議和史事考〉，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4: 110-111。

34 劉備敗退白帝城，蜀、吳之間的接觸恢復，不過，孫權仍然心存猶豫。劉備死後，孫權認爲「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因而接受了乘劉備死而反蜀的益州大姓雍闓的投降，並遙授之爲永昌太守。直至諸葛亮派鄧芝出使吳國，孫權才決意親近蜀漢而與魏絕交。可參《三國志》，卷45〈鄧芝傳〉，頁1071-1072。

35 公孫淵祖父公孫度在漢末割據遼東，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雖受曹操封賜而心不服。公孫淵襲位後，對曹魏陽奉陰違，並交通孫權，接受燕王之封。238年，公孫氏爲司馬懿所擊滅。

36 《三國志》，卷39〈陳震傳〉，頁985。

37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35。

以向魏效忠。倖存的吳人，歷盡艱辛，才得以逃到句驪境內，輾轉回國。³⁸此次事件，成爲吳國外交史上最大的恥辱，孫權感到顏面掃地，在惱羞成怒之下，決計親自出兵遼東。這當然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構想，經過臣下極力勸阻，孫權也冷靜下來考慮，這無謂的舉動自然被放棄。³⁹

爲了在軍事上爭取勝利，彌補外交上的恥辱，孫權接連在233、234年，發動對魏的進攻。234年一役，孫權親率大軍包圍魏的合肥新城，同時還有諸葛亮在關中牽制魏軍，吳軍卻無功而回。孫權在對外軍事上遭遇挫折，不免意沮，因此，魏國使者於235年要求以馬交易珠璣、翡翠等物，孫權也沒有對魏國的要求採取強硬態度，反而接受了這項交易。

234年，一直堅持蜀、吳聯盟的諸葛亮病逝。孫吳憂慮魏國乘機進攻失去重心人物的蜀漢，便在巴丘增加一萬名駐軍，一方面作爲救援蜀國的準備，另一方面，若有可乘之機，則溯江而上，與曹魏分割蜀地。⁴⁰吳國的兩手準備，再次說明其外交策略隨情況而行動的彈性，既可對蜀漢堅守盟約，也伺機分割蜀地。等到蜀漢穩定下來，吳軍於237年再次出兵攻魏。239年，孫權遣軍渡海至遼東。雖然公孫淵已爲魏所滅，但吳軍至遼東後，仍然襲擊魏的守將，並擄掠當地人民而還，算是一吐當日恥辱的怨氣。此後，直至孫權在252年逝世的十三年中，吳國與魏國曾多次交戰。在對蜀關係方面，則一直保持和諧。即使在244年，謠傳蜀漢將與魏聯軍攻吳，孫權以堅定的態度表示不可相信流言，顯示他鞏固吳、蜀關係的決心。

孫權死後，以太傅身分輔助少主孫亮的諸葛恪繼承了親蜀敵魏的路線。面對魏軍乘孫權之死而大舉攻吳的嚴峻形勢，諸葛恪親往前線指揮抗敵，並在東興大破魏軍，取得勝利。

對魏軍取得大勝後，諸葛恪雄心萬丈，決意發動對魏的大規模進攻。吳國大臣群起反對，爲此，諸葛恪向眾人解釋他發動軍事行動的原因：

38 西嶋定生，〈親魏倭王冊封に至る東アジアの情勢——公孫氏政權の興亡を中心として〉，載氏著，《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頁469-511。該文從當時的東亞形勢著眼，對孫權、公孫淵與曹魏的交涉有細緻討論，值得參考。

39 可參《三國志》，卷53〈薛綜傳〉，頁1253-1254及卷57〈陸瑁傳〉，頁1337-1338。特別是薛綜，從戰術、氣候、地形等問題分析吳軍進攻遼東的不利之處，頗爲仔細。

40 《三國志》，卷45〈宗預傳〉，頁1075。

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眾，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眾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眾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眾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⁴¹

諸葛恪之論，從分析魏、吳兩國國力入手。他認為魏國土地、人口皆比吳為多，所能動用的資源、所擁有的潛力皆較吳為強。而現在魏國的軍事力量已經減弱，因為在推行世兵制的情形下，曹操時代的精兵已經消磨殆盡，而下一代的新兵年紀尚輕，反映曹魏的軍事力量下降，正是吳國的可乘之機。此外，魏國經過高平陵事件（248年），⁴²司馬懿殺曹爽後，曹魏政權已落入司馬氏手中，司馬懿救平王凌舉兵（250年）後便死去。⁴³對於繼任的司馬師，諸葛恪認為他難孚眾望，因此，應趁魏國內部不穩的機會出兵。⁴⁴他又進一步推測，若放棄此次機會，待得十數年後，魏國新兵成長，人口增多，而吳國現有精兵或老或死，形勢逆轉，就不可能抗敵了。

諸葛恪之言未嘗無理，不過，他既輕視司馬師及魏軍的能力，錯誤地把東興之役的地區性勝利評估為對魏國的嚴重打擊，對吳軍的實力又抱有過大的信心，對進攻魏國亦沒有妥善的作戰方案，還不顧吳國上下的反對，以致「違眾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眾，百姓騷動，始失人心。」⁴⁵結果是大敗而

41 《三國志》，卷64〈諸葛恪傳〉，頁1435-1437。

42 魏明帝曹叡死後，曹魏宗室曹爽與大臣司馬懿共同輔助少主曹芳。曹爽與司馬懿兩派明爭暗鬥，終於在248年，司馬懿乘曹芳率領曹爽等人到高平陵致祭時，發動政變。曹爽一派放棄抵抗，先遭軟禁，後遭殺害。從此，曹魏國柄便落於司馬氏手中。

43 高平陵事件後，司馬懿掌握曹魏大權，魏將王凌與鎮守淮南的外甥令狐愚密謀扶立楚王曹彪，事泄，為司馬懿所擒，王凌服毒自殺。

44 諸葛恪邀約姜維率領蜀軍夾擊魏國，有言「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說明他認為魏國內外交困，給予吳、蜀可乘之機。見《三國志》，卷64〈諸葛恪傳〉，頁1435。

45 同上註，頁1437。

回，吳國上下對諸葛恪心懷怨望，孫峻乘機殺之而擅政，吳國政局遂陷入混亂之中。

孫峻雖然藉反對諸葛恪而執政，但吳國的外交政策並沒有改變。255年，魏國毋丘儉、文欽以反對司馬氏為號召起兵，孫峻便乘機攻魏，還接受了前來投奔的文欽。孫峻聽取文欽的建議，部署再度攻魏，行動雖因他死去而取消，但繼任執政的孫綝沿襲這條路線。257年，魏將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向吳稱臣，吳國派大軍往援。同時，孫綝在剷除政敵後，派遣刁玄使蜀，向蜀漢解釋吳國連串政治動盪的因由，亦可見雙方同盟關係的維持。

自諸葛恪大舉攻魏敗還，至孫琳時壽春陷落，守城吳軍盡沒，五年之間，吳國與魏的大規模戰事均以失敗告終，吳國元氣大傷。此後數年，吳國內困於政治衝突，魏國方面則集中力量為滅蜀和司馬氏的篡代作準備，雙方因而得到短暫的和平。

263年，吳國交阯郡爆發大規模叛亂，⁴⁶同時，蜀漢受到魏國的入侵而向吳求援，南方二國的形勢均十分危急。蜀漢迅速敗亡（263），赴援的吳軍遂改變策略，以救援為名，乘時奪取益州土地為實。對於吳國撕毀盟約的行為，蜀漢殘餘守將均表憤慨，遂堅拒吳軍，並轉而降魏。⁴⁷吳國最後一次施展「彈性外交」，終不能在蜀亡之役撿得好處，還因此喪失盟友。蜀漢滅亡，意味著吳國要獨力應付強大的魏國。

吳國在益州未能取得便宜，交阯亂軍首領呂興更與新併蜀漢的曹魏聯結，魏國得以派遣太守進駐交阯，使吳國處於被三面包圍的態勢。蜀漢已滅，吳國自然成為魏國統一計畫的下一個目標。不過，魏軍在滅蜀之後，一方面需要休整，並部署攻吳；另一方面，其國內正處於改朝易代之際，因而暫緩了對吳的軍事行動，吳國在孫皓的統治之下，度過了十六年才滅亡。

在孫皓的統治下，吳國外失盟邦，內有交阯之憂，而收復交阯尤為迫切。經過多次努力，吳軍終於在271年收復交阯。不過，在這段時間，吳國

46 漢末亂離，交阯一地為太守士燮兄弟割據。209年，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交阯始屬吳，然士氏子弟仍多不服，終至兵戎相見，吳國訴諸武力才鞏固在交阯的統治。263年，吳交阯郡吏呂興乘民眾對吳的徵發不滿，起兵反吳，殺太守孫讚，並遣使向魏請兵及太守。

47 《三國志》，卷41〈霍峻傳〉裴注引《漢晉春秋》，頁1008-1009。

並未因內外之憂而放棄北進的意圖。孫皓派往晉國弔祭司馬昭的使者，在返國後聲稱「北方守戰之具不設」，⁴⁸孫皓立刻便有北進之意。雖因陸凱的諫阻而止，但孫皓向北進攻的意圖沒有稍減，並聽信讖語，以為可以一統天下，因而一直對晉採取輕蔑的態度。⁴⁹

蜀亡之後，孫吳獨力承受北方的軍事壓力，兩國實力的差距日益明顯。當晉國完成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準備，於279年發動滅吳戰役，以六路大軍攻吳。280年，王濬率領的晉軍從益州順流而下，勢如破竹，孫皓一片降幡出石頭，吳國也就不得不亡了。

三、孫吳推行「彈性外交」的條件與原因

上文簡述了孫吳的外交策略，下面進一步探討孫吳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推行「彈性外交」，以及這種策略是受到甚麼因素的影響。

從當時國際秩序的結構而言，孫吳得以施行「彈性外交」的關鍵在於三國分立的局勢。魏、蜀、吳三國鼎立，尤以魏、蜀二國之間敵意最深，正好為孫吳依違其間提供了機會。

對魏國而言，併吳、蜀而一天下，是一貫的目標。曹操在生之時，繼赤壁之戰後，仍兩次領軍攻吳（213、216年）。曹丕在吳、蜀夷陵大戰（222年）後，便對孫吳發動大規模進攻（222年），又親至廣陵，為渡江攻吳作出準備。曹丕死後，曹魏諸帝雖再沒有親自領軍攻吳，但吞吳之心並沒有消失。不過，三國鼎立，魏國雖然較其他二者強大，要消滅對手卻也不是輕易的事，更何況蜀、吳兩國各有地理優勢憑依，君臣上下精兵猛將亦多，誠非易於對付。特別是蜀漢以漢室之後作為標榜，對魏國提出漢賊不兩立的口號，成為魏國的頭號對手。面對這樣的情況，魏國當然盡量避免同時與兩個對手開戰。為此，對於吳國的「彈性外交」，魏國朝廷之中，就有提出容讓的呼聲。提出包容吳國的依違的官員多以文官為主，他們所持的論調是主張魏

48 《三國志》，卷48〈三嗣主傳〉，頁1165。

49 孫皓聽信如「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吳天子當上」、「青蓋入洛陽」等語，以為天命在己。見《三國志》，卷48〈三嗣主傳〉裴注引《江表傳》，頁1168。

國先從內政入手，增強自身的實力，才進一步開展吞吳滅蜀的計畫，是一種內政導向型的策略，以內政為優先考慮。

早在214年，曹操計畫攻吳，傅幹就勸曹操應首先整頓內政，蓄積力量，然後才可吞併吳、蜀。傅幹舉出的理由為：「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⁵⁰就是說吳國擁有長江天險，並非一戰可滅，若曹操頓兵長江，未能破吳，只有自招損失。因此，應採取長期發展的方針，再謀求戰勝對手。後來，曹操在長安部署攻蜀。劉廙勸阻曹操，也是認為應該以內政為先，務農積穀，蓄積力量，待國富民安，然後可以德服吳、蜀。⁵¹

傅幹、劉廙的建議暗示了短期內不能輕易戰勝吳國，而且需要對之容讓。這樣的論調，在北方朝廷的文官之中，頗為普遍。曹丕在繼位魏王之後，也對吳國發動攻勢。霍性上言諫阻：「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⁵²認為曹丕剛剛繼任，實在不宜輕易出兵，應該先安定內部，才考慮攻吳。曹丕稱帝後（220年）更銳意於統一天下。當孫權假意歸順，曹丕滿心歡喜，賜封孫權為吳王，寵遇甚隆。對此，魏國的大臣皆表示反對，三公華歆、王朗、賈詡便認為孫權不足信賴，是「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終非不侵不叛之臣。」⁵³劉曄也認為「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⁵⁴稱藩的舉動，不過是為了集中力量應付劉備沿江而下的大軍。⁵⁵然而，曹丕並不理會。當孫權解決了與劉備的衝突之後，便謀求脫離魏國的制約，使得曹丕大怒攻吳。

其實，早在曹丕即位之初，他便曾詢問賈詡，若要統一天下，吳、蜀二國，應以何者為首要目標。賈詡的答覆是：

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

50 《三國志》，卷1〈武帝紀〉裴注引《九州春秋》，頁43-44。

51 《三國志》，卷21〈劉廙傳〉，頁615-616。

52 《三國志》，卷2〈文帝紀〉裴注引《魏略》，頁60。

53 《三國志》，卷47〈吳主傳〉裴注引《魏略》，頁1127。

54 《三國志》，卷14〈劉曄傳〉，頁446。

55 同上註，頁447。

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⁵⁶

賈詡從地理和人才的條件作出分析，認為魏國當時仍無能力消滅吳、蜀，因此主張先專心內政，待實力雄厚才出兵平定吳、蜀。曹丕並不接納這樣的建議，結果有江陵之敗。曹丕的軍事行動徒勞無功，只好聲稱：「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徭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⁵⁷以華麗的辭藻為自己的失敗粉飾。⁵⁸

225年，曹丕又計劃攻吳，令群臣作出討論，鮑勛認為：「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⁵⁹因而極力反對。這一次的勸阻並沒有成效，以致有廣陵之役，⁶⁰曹丕望江興歎之恨。

辛毗亦曾諫阻曹丕攻吳，他認為：

吳、楚之民，險而難禦，……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叟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⁶¹

對攻吳抱持反對態度者，多在地理因素上立論，而且往往吳、蜀並舉。即使反對攻蜀，與反對攻吳的論調亦頗相似。例如華歆反對曹真攻蜀（230年），便提出：「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⁶²認為

56 《三國志》，卷10〈賈詡傳〉，頁331。

57 《三國志》，卷2〈文帝紀〉裴注引《魏書》，頁83。

58 曹操父子皆希望在有生之年消滅吳、蜀，一統天下。前述劉廙勸曹操緩圖吳、蜀，曹操的答覆是：「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曹丕亦曾表示他之所以攻吳是不欲遺虜於子孫。見《三國志》，卷21〈劉廙傳〉，頁616；卷25〈辛毗傳〉，頁697。

59 《三國志》，卷12〈鮑勛傳〉，頁385-386。

60 曹丕於224、225年連續兩次領軍攻吳，未與吳軍交鋒，至長江而還。田餘慶認為這樣的軍事行動是曹丕為解決青徐豪霸問題而發的。其說見〈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一文。

61 《三國志》，卷25〈辛毗傳〉，頁697。

62 《三國志》，卷13〈華歆傳〉，頁405。

遠道攻蜀，未見其利，先受其弊，因而主張應以內政為先，待魏國國力充盈，才對蜀、吳採取軍事行動。王肅與華歆意見一致，也認為如此遠道攻蜀，有害無利，不如「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⁶³而魏明帝曹叡對華歆的答覆，確耐人尋味。他說：「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⁶⁴曹叡這一番話反映了當時文武之間在統一戰爭中的優先次序不同。文臣主張以內政為先，待蓄積足夠力量才開戰；武將則認為蜀、吳並不會自動降服，假以時日，更不知蜀、吳力量如何，因而應當進取，即使未能成功，也可以試探對方虛實。

文臣以內政為先的主張，反映了曹魏面對的現實問題——未能在短期內消滅吳國。因此，曹魏雖然不放棄對吳用武，卻也不得不容讓吳國的行為。孫權稱帝，又私通公孫淵，皆嚴重侵犯了曹魏的利益，曹叡大為忿怒，雖遣司馬懿擊滅公孫淵，但對於孫權，卻只能加以指責，而不能採取任何實際的懲罰行動。魏國一時無力滅吳，對之只好加以容忍，遂給予吳國自由活動的空間。

至於蜀漢，雖與吳國為爭荊州而兵戎相見，不過，在夷陵之戰後，劉備已明白吳、蜀聯盟的重要性，遂遣使與吳重修舊好。劉備逝世，諸葛亮執政，更重視與吳國的同盟關係。諸葛亮一心復興漢室，與魏國誓不兩立。但蜀漢既要集中力量對付曹魏，就要避免與吳國結釁，以解除兩面作戰的威脅。因此，蜀漢對孫吳也採取了容讓的態度，希望與吳國保持聯盟抗魏的關係，即使孫吳不對曹魏發動攻勢，至少也不會對蜀漢構成威脅。

在諸葛亮執政期間，這一方針獲得嚴格執行。因此，孫權稱帝，遣使入蜀，建議二帝並尊。蜀漢大臣對此均表反對，「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⁶⁵諸葛亮卻因為不欲與吳國斷絕關係，以免讓魏國有機可乘，反而主張承認孫權稱帝，並解釋云：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

63 《三國志》，卷13〈王朗附王肅傳〉，頁415。

64 《三國志》，卷13〈華歆傳〉，頁405。

65 《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裴注引《漢晉春秋》，頁924。

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⁶⁶

於是，諸葛亮派遣陳震出使吳國，並與孫權訂立平分天下的盟約。吳、蜀合作，對雙方皆有利。蜀使鄧芝曾對孫權說：「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⁶⁷正點出了吳、蜀唇齒相依的關係。即使在諸葛亮死後，孫吳恐怕魏國乘機攻蜀，便在巴丘增兵萬人，一方面表示救援蜀漢的姿態，另一方面欲藉機分割蜀漢領土。蜀漢對於吳軍的行動，亦只是增兵永安以作回應，還派遣宗預使吳，以調解兩國的緊張關係。宗預向孫權明白表示：「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⁶⁸清楚說明了蜀漢重視與孫吳保持聯盟關係。正因如此，蜀漢爲了維持這段同盟關係，才願意容忍吳國的「彈性外交」。

然而，隨著蜀漢的滅亡，吳國孤在江南，魏國發動對吳的統一戰爭只是時間問題。當時魏國朝廷亦明白吳國所處的困境：「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荊、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侯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兵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眾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⁶⁹吳國衰敗之象如此，造就了魏國滅吳的大好良機。⁷⁰待得曹魏易代之後，晉室興兵，吳便土崩瓦解了。

魏、蜀的嚴重對立，給予孫吳施行「彈性外交」的空間。魏、蜀的嚴重矛盾，其基礎表現在雙方正統論的對立。

一個政權的維持，除了依靠武力作爲後盾，還需要在理論和儀式上彰顯

66 同上註，頁 924-925。

67 《三國志》，卷 45〈鄧芝傳〉，頁 1072。

68 《三國志》，卷 45〈宗預傳〉裴注引《吳歷》，頁 1076。

69 《三國志》，卷 4〈三少帝紀〉，頁 152。

70 蜀漢亡後，鄧艾立即向司馬昭建議部署滅吳，不過因遭誣謀反被殺而其事不成。見《三國志》，卷 28〈鄧艾傳〉，頁 780。

自身統治的合理性和認受性。在傳統中國政治中，這表現為對「正統」的討論。當國家處於分裂時，統治者在兼併戰爭之中，對自身的正統理論基礎，更有強烈的要求。所謂「正統」，就是一個政權為自身統治賦予意識形態、儀式、理論上的基礎，解釋自身之所以能夠取得統治地位的根據，藉以服信人心，為被統治者承認、支持。⁷¹三國之間，除了在軍事上的競爭，更為了解釋自身統治的正統性而競爭，彼此皆爭相宣稱為「正統」，以承繼漢室崩潰後遺留下來的「天命真空」。

三國聲稱自身為正統的理據各有不同。曹魏宣稱天命從漢室轉移到曹氏身上，因此而受漢禪讓，創業垂統。⁷²曹魏既自視繼承漢室，自然需要消滅吳、蜀，重建大一統帝國。蜀漢的劉備，是以「帝室之胄」作號召的，⁷³因此，曹魏被視為篡漢自立，蜀漢對之自然有不共戴天之仇。魏、蜀兩者皆極度強調自身與漢室的繼承關係，因而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⁷⁴

至於吳國，孫堅以「孤微發跡」，⁷⁵孫策被時人視為逆賊袁術的部下，孫策、孫權又誅戮江東英豪，傳至孫權手中，除了武力的憑依外，孫氏實沒有多少立國之資，更遑論紹承天命，繼漢室而統天下。因此，吳國在強調自身的正統位置以爭天下時，便遭遇到難題了。吳國的正統論只能表現在孫堅出

71 有關中國歷代正統論的內容、演變與爭議，詳參 Hok-Lam Chan,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1115-123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pp. 19-48 及陳學霖，〈歐陽修正統論新釋〉，載氏著，《宋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 129-140。

72 有關漢魏禪代的研究可參 Carl Leban, "Managing Heaven's Mandate: Coded Communications in the Accession of Ts'ao P'i, A.D. 220," in David T. Roy and Tsuen-hsuei Tsien (ed.),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15-341.

73 《三國志》，卷 35〈諸葛亮傳〉，頁 913。不過，劉備以漢室疏屬，甚至販履織席為生，究竟有多大的號召力是不無疑問的。我們知道，劉備在赤壁之戰前，一直周旋於群雄之間，棲棲遑遑無寧處。而且，在當時的州牧之間，身為漢宗室的還有幽州牧劉虞、荊州牧劉表、益州牧劉焉，皆比劉備顯赫。反倒是諸葛亮一直強調劉備的帝室身分，以與魏國抗衡。

74 有關三國時代的正統論爭，可參范家偉，〈三國正統論與陳壽對天文星占材料的處理——兼論壽書無「志」〉，載黃清連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131-180。

75 《三國志》，卷 46〈孫破虜討逆傳〉，頁 1112。

生的神話、⁷⁶孫堅得到漢傳國璽、孫氏在江東應東南之運、⁷⁷江東有黃龍見⁷⁸等缺乏理論性的證據。與魏、蜀比較，孫吳的正統根據薄弱，自不免吃虧，矮了一截。不過，從另一方面言之，孫吳在正統論上的負擔卻又較魏、蜀為輕，不必堅稱自身紹承漢室，逼切地以一統天下為己任，而孫權在行動上也可以得到更大的伸縮性。因此，史載：

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⁷⁹

孫權本有稱帝之意，但因為恐怕自身稱帝的理據不足，遂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先向魏稱臣，以博取魏國的優禮，並建立一個恭順的形象。在對外表示恭順的假象下，孫權暗中向曹魏挑釁，逼使對方採取強硬手段，如此便可以受委屈的形象得到國內輿論支持，乘抗魏而稱帝。因此，當孫權決定接受魏國冊封，其臣下多有反對，並勸其不受魏封，自稱「上將軍九州伯」時，孫權卻回答：「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耶？」⁸⁰孫權的包袱較魏、蜀的君主為輕，他可以接受魏國的冊封，忍隱以成大事！他後來為此再向群臣解釋：「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

76 《吳書》云：「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見《三國志》，卷46〈孫破虜討逆傳〉裴注引《吳書》，頁1093；而《建康實錄》引《祥瑞志》則記孫堅父孫鍾云：「鍾家於富春，早失父，幼與母居，性至孝。遭歲荒，儉以種瓜自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曰：『此山下善，可葬，當出天子。君望山下百步許，顧見我等去，即可葬處也。』鍾去三四十步便返顧，見三人並成白鶴飛去。鍾記之，後死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及堅母懷孕，夢腸出繞吳閭門。以告鄰母，母曰：『此夢安知非吉祥也。』」見《建康實錄》，卷1〈太祖上〉，頁3-4。兩則資料同為宣傳孫吳興起乃有天意。不過，比較兩條材料，《實錄》所載孫鍾以種瓜為生，更可印證陳壽謂孫堅「孤微發跡」。

77 范家偉，〈三國正統論與陳壽對天文星占材料的處理——兼論壽書無「志」〉，頁140-143。

78 同上註，頁150-156。

79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3。

80 《三國志》，卷47〈吳主傳〉裴注引《江表傳》，頁1123。

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爲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⁸¹這裡，孫權明白說出爲了避免與劉備交戰之時曹丕會乘虛而入，造成兩面作戰的危局，因此才與魏國通好，實在是他審時度勢下的選擇。所以陳壽認爲「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⁸²就是說，孫權可以像春秋時代的勾踐那樣，一方面忍辱負重，一方面選任賢能，伺機而動，終能成就一番霸業。孫權既能夠向曹氏低首，甘願稱藩；也願意在與蜀漢兵戎相見之後，重修舊好，端賴的就是沒有如魏、蜀的正統論的沉重負擔。

從孫吳國內政治因素言之，山越問題成爲孫吳建國之初推行「彈性外交」的重要考慮。⁸³孫吳立足江東，丹陽、吳郡、會稽、新都、鄱陽、豫章等郡遍佈山越，範圍遍及今日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他們「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負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讎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⁸⁴成爲江東政權的腹心之患。孫權年輕之時，便曾經受到山越突襲而險些喪命。⁸⁵因此，孫吳不得不集中力量對付山越，以求消弭內亂，而其國內不少將領，如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諸葛恪等即以鎮壓山越而起家。⁸⁶此外，山越還往往受到曹魏的利用，藉機發動亂事，對孫吳構成嚴重威脅。⁸⁷山越對孫吳政權的威脅，足以牽制了孫吳的武裝力量，掣肘了孫吳的對外發展。在孫策與孫權的時代，其情況尤爲嚴重。史稱「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⁸⁸明白指出了

81 同上註，頁1130。

82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49。

83 孫吳與山越的關係，可參傅樂成，〈孫吳與山越之開發〉，載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81-91；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載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3-29。

84 《三國志》，卷64〈諸葛恪傳〉，頁1431。

85 《三國志》，卷55〈周泰傳〉，頁1287-1288。

86 可參《三國志》各人本傳。

87 傅樂成，〈孫吳與山越之開發〉，頁84-85。

88 《三國志》，卷60〈賀全呂周鍾離傳〉，頁1395。

山越對孫吳的巨大牽制作用，以致孫權不得不考慮「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⁸⁹而向曹魏稱臣。孫權曾經對蜀使鄧芝說：「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虛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⁹⁰又在派遣張溫出使蜀漢之前訓示：「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丕。」⁹¹孫權坦白說出受到山越的困擾，因而不能夠放心對外的軍事行動，亦因此而影響了外交政策的變動。不過，在孫權晚年，山越的問題已得到解決，經過諸將的努力，山越對孫吳統治已不構成威脅，還轉化成了孫吳的生產力和兵源。因此，山越問題在孫權晚年及對嗣後國君而言，已不構成影響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了。

最後，當然不能不提孫策定下的「保江東、觀成敗」的方針對孫吳外交策略發展的影響。

孫策在臨終之時，定下了「保江東、觀成敗」的立國方針，孫權與臣下以保守江東政權為底線，待機而動，形勢有利便積極進取，爭霸天下；形勢不利的時候，可以忍辱負重，不惜稱臣納貢，以保江東基業，待時勢有利，再採取行動。「保江東、觀成敗」給予了孫吳在對外關係中的回旋餘地，得以施行「彈性外交」的策略，從中取利，而吳國才智之士如周瑜、魯肅、呂蒙等人，便在這個原則下，規畫了吳國先取荊州，再取益州，繼而一統天下的藍圖。

史臣評論孫策，認為「割據江東，策之基兆」、⁹²「創基立事，策之由也。……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⁹³這樣的讚譽，並非溢美之詞。孫策既以武力開拓江東基業，又為孫權留下不少謀臣猛將，他「保江東、觀成敗」的遺言，更成為了孫吳立國的指導思想，也為推行「彈性外交」提供了

89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5。

90 《三國志》，卷47〈吳主傳〉裴注引《吳錄》，頁1131。

91 《三國志》，卷57〈張溫傳〉，頁1330。

92 《三國志》，卷46〈孫破虜討逆傳〉，頁1113。

93 《三國志》，卷46〈孫破虜討逆傳〉裴注引孫盛曰，頁1113。

空間，成爲孫吳此一外交策略的核心思想。因此，孫策對吳國的貢獻實極爲深遠。

四、結 論

漢末的混亂，標示了統一帝國的崩潰。舊的秩序已被打破，而在新的大一統秩序尚未建立起來，緊接著的三國時期代表了一段探索新秩序的過程。三國之中，「孫吳霸業之起，在魏、蜀前；稱王稱帝，在魏、蜀後，其建國道路，曲折而又漫長」，因而引起了學者對孫吳建國過程的探討。⁹⁴其實，孫吳不但在建國道路上與魏、蜀不同，即便在外交策略上也與前二者不同，顯出了自身的獨特性。

本文認爲孫吳所施行的是「彈性外交」，就是不囿於固定路線，伺機而動的一種外交策略。孫吳得以施行這種政策，其原因可從兩方面分言之。一、「國際」秩序的結構性因素：即1.魏國一時不能滅吳，對吳國的反覆無可如何；2.蜀漢既無力滅魏，又需要吳國作爲盟友，只好作出容讓；3.吳國缺乏進行統一的正統論基礎，有弊有利，弊處在於與魏、蜀相比時不能提出鮮明的正統理論，需要依違其間，可是好處卻在於吳國因而缺少了那種「誓不兩立」的包袱，可以隨利益而改變立場。二、國內政治因素：1.孫吳建國之初，長期受到山越困擾，對其形成一定的掣肘，爲安定內部，不可輕啓邊釁；2.吳國受到「保江東、觀成敗」的立國方針所影響，在保守江東的基礎上，爲生存、發展須因應時勢而改變外交立場。

在漢帝國崩潰後的歲月中，群雄並起，而曹、劉、孫三家終能脫穎而出，形成三方鼎峙的局面，其中原因非一。不過，就孫吳而論，其運用靈活的手腕，善於利用外在形勢，施行「彈性外交」，積極地爲自身的生存尋找出路，而有相當成效，實爲孫吳存續國祚的重要因素。

後 記

2003年5月5日，突然收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曾瑞龍教授遽歸道山的

94 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44。

消息。回想本文從構思、撰寫，至完稿，均得益於曾師的指點和鼓勵。惟拙文如今雖可刊出，卻無從面告曾師了！在修改拙文的過程中，每憶起多年來從曾師學習的片段、與曾師交往的點滴；默念老師的指導與關懷，痛失良師，不禁悵然！特此一筆，以誌一段師徒因緣。

謝偉傑

2003年5月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唐·許嵩，《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二、近人論著

方詩銘 2000 《三國人物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方北辰 1989 〈蜀吳夷陵之戰後議和史事考〉，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4: 110-111。

王 素、宋少華、羅新 1999 〈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5: 26-44。

田餘慶 1993 〈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載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頁89-118。

田餘慶 1993 〈孫吳建國的道路〉，載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頁244-275。

西嶋定生 1983 〈親魏倭王冊封に至る東アジアの情勢——公孫氏政權の興亡を中心として〉，載氏著《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頁469-511。

李培棟 1996 〈六朝國策異同論〉，載氏著，《魏晉南北朝史緣》，上海：學林出版社，頁95-107。

- 范家偉 1998 〈三國正統論與陳壽對天文星占材料的處理——兼論壽書無「志」〉，載黃清連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131-180。
- 約瑟夫·A·凱米萊爾、吉米·福克爾著，李東燕譯 2001 《主權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唐長孺 1955 〈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載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頁3-29。
- 陳學霖 1993 〈歐陽修正統論新釋〉，載氏著，《宋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129-140。
- 景有泉 1996 〈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問題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5: 8-11。
- 傅樂成 1995 〈孫吳與山越之開發〉，載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81-91。
- 傅樂成 1995 〈荊州與六朝政局〉，載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93-101。
- 劉伯驥 1962 《春秋會盟政治》，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饒勝文 2002 《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Camilleri, Joseph A., and Jim Falk. 1992. *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 Chan, Hok-Lam. 1984.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1115-123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Kazhdan, Alexander. 1992. "The Notion of Byzantine Diplomacy." In Jonathan Shepard and Simon Franklin, ed., *Byzantine Diplomacy AD 800-1204*. Hampshire: Variorum, pp. 3-21.
- Leban, Carl. 1978. "Managing Heaven's Mandate: Coded Communications in the Accession of Ts'ao P'i, A.D. 220." In David T. Roy and Tsuen-hsui Tsien, ed.,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315-341.
- Tao, Jing-shen. 1988.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Walker, Richard L. 1953. *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Hamden, Conn.:

Shoe String Press.

Worthy, Edmund H. Jr. 1983. "Diplomacy for Survival: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Wu Yüeh, 907-978." In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7-44.

Elastic Diplomacy: The Wu Kingdom in Pursuit of Survival

Wai Ki Wicky Tse *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kingdom of Wu (200-280) adopted a unique diplomatic strategy, which the author refers to as “elastic diplomacy,” to survive. This strategy stresses having the flexibility to respond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exploit available opportunities. In practice, the Wu would act as a client state of the Wei dynasty (220-265) or an ally of the Shu Han state (221-264), depending on its own interests. This paper tra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y and concludes that its efficacy was influenced by several exter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The Wei and the Shu were long-time rivals that competed for the cooperation of the Wu and the right to lay claim to being the legitimate successor to the Han dynasty. The Wu, on the other hand, devoted all of its resources to suppressing the mountainous Yue people and were continually affected by the policy of flexibility formulated by Sun Ce (孫策 184-200), the founder of the regime.

Keywords: Three Kingdoms, Wu kingdom, Sun Chuan 孫權, legitimacy, elastic diplomacy

* Wai Ki Wicky Tse holds a M. Phil in history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is an editor at the SNP Panpac (HK) Ltd.